

「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研究

李紫嫣*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摘要：本文通過問卷對「新冠」疫情期間海內外漢語教師線上教學的創新意願開展調查研究，研究對象為104名全職漢語教師。本文分析了性別、學歷、學校類別和授課形式等因素對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影響。結果顯示，性別和授課形式因素對創新意願沒有表現出顯著性，而學歷和學校類別因素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線上教學；漢語教師；創新意願

Studie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Online Teach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Ziyan L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urvey on the online teaching innovation willing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onducted. A total of 104 full-tim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in online teaching,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school category, and teaching method, etc.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ors of gender and teaching method on their willingness, whi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ors of education and school category.

Keywords: Onlin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0 研究背景

疫情期間，海內外學生的學習方式逐漸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世界出現了史上規模最大而且影響深遠的教育改革。這種前所未有的變革必然會引起教學模式、資源和方法的巨大變化，以及教學觀念、內容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創新。如何實現特殊時期的教學創新，是所有教育從業者正在面臨的現實問題。

漢語教師是漢語教學中「三教」問題的核心

(崔希亮, 2010)^[1]，但是在漢語教學領域，專門針對漢語創新的研究並不多見。人們主要關注教師的知識結構、教學方法和理論、教師標準和培訓制度等方面(劉力、葛凡堯, 2019)^[2]，且多是以理論分析為主的質性研究，量化研究並不多見。為了解當前漢語教師教學創新的現狀，筆者以「漢語教師創新」為主題在CNKI資料庫進行了論文檢索，檢索到的文獻數量極少，僅有8篇，最早的文獻發表於2008年，最新的發表於2018年。

*通訊作者：李紫嫣，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漢語國際教育。E-mail: ibonnieli@foxmail.com, Tel: 65638595

1 研究目的

疫情期間教學環境和形式的根本性改變，意味著教學創新已經成為了「剛需」。本文希望通過問卷了解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的創新意願，探究教師性別、學歷、學校、學校類別與授課形式等因素是否對創新意願具有顯著性影響，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以引起更多學者關注漢語教師的創新研究。

2 研究設計

2.1 理論基礎

結合已有文獻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教師的人格、認知風格、內在動機、自我效能等個體因素與學校組織氣氛、組織文化等情境因素均是影響教師创新的主要因素。教師創新又可分為創新意願、創新行動和創新成果三個維度（張敏，2011）^[3]。其中，教師的創新意願在教學實際中既會受到各種內部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王振宏等，2010）^[4]。但是作為內部和外部因素的重要方面：教師的性別、學歷、學校類別及授課形式等是否會影響到教師的創新意願，則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

所謂教師創新意願，是指教師進行教學改革與變革的意識和願望，包括教師革新教學的想法、學習新思想的意識以及對教學中的新方式方法持積極開放的態度等（張敏，2011）^[3]。由於教師的教育觀念直接影響其對教學情境的知覺和判斷，進而會影響其教學行為（黃四林等，2005）^[5]，所以教師的創新意願也將直接影響其教學創新行為。因此，對於問卷和分析中涉及到的少量創新行為問題，將一併納入創新意願處理。

2.2 問卷設計

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的王振宏等人為了深

化對教師的教學創新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編制了《教師教學創新問卷》（申繼亮、陳英和，2014）^[6]，是主要用於測評教師教學創新意願的單維度問卷。本文在參考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量表改編方法之後，結合漢語教學的特點、疫情期間線上授課的實際情況及研究對象的群體特徵對原量表進行了改編。改編後的題項共計 18 個，與原始量表數量一致。

問卷為匿名填寫制，僅收集被試年齡、性別、學歷、學校類別及授課課型等信息。之後，被試根據題目做出自評。每題下設 5 個選項，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對應 1 分到 5 分，問卷最終得分是 18 個題項的平均分。若被試最終得分不足理論平均值（即 3 分），則說明其創新意願較弱；若超過理論平均值，則說明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願，分數越高意味著被試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教學創新意願越強。

2.3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 104 名全職漢語教師（不包括兼職教師、實習教師等），工作地點分別在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和境外。性別上，男性 24 人，女性 80 人；學歷上，104 名被試全部具備碩士學歷，其中 20 人有博士學位；學校類別上，就職於小學的教師 16 人，中學 18 人，高中 15 人，大學 40 人，語言機構 15 人；授課形式上，共有 52 人使用直播課，27 人使用錄播課，25 人同時採用直播課和錄播課兩種方式授課。

2.4 研究方法

首先發放並回收自評問卷，進行數據分析。其次，為了解疫情期間線上漢語教學的真實案例，本文也採用了開放式訪談法作為輔助。在尊重被試隱私的基礎上，邀請部分漢語教師參加線上訪談，內容涉及量化研究中較難測量到的個性化問題，如線上課堂的具體情況、對線上授課的感性

認識與學生反饋等。最後綜合統計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2.5 研究步驟

筆者共回收問卷 114 份，其中有效問卷 104 份，有效問卷率為 91.20%。包括中國大陸地區問卷 68 份，港澳臺問卷 4 份、海外問卷 32 份。問卷回收整理後，使用 SPSSAU 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2.6 信度、效度檢驗

本文通過 Cronbach's α 的係數值檢驗問卷信度。Cronbach's α 的係數值通常在 0 到 1 之間，如果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5 及以上，則說明內部一致信度到達理論可接受值，高於 0.9 則說明量表內在一致性非常理想。

原問卷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1，效標關聯度 0.61。在依照本研究的背景、目的和對象的實際情況進行改編後，新問卷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08，高於 0.9，表明回收的數據具有比較高的信度品質，可進行後續的分析，詳見表 1。

表 1 「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
創新意願調查問卷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信度分析		
項數	樣本量	Cronbach α 係數
18	104	0.908

此外，由於問卷的題項屬於態度量表題，為保證修改後的量表具有較高合理性，筆者也進行了效度測試。使用 KMO 和 Bartlett 進行效度檢驗後，得出 KMO 值為 0.837，大於 0.8，且對應 p 值小於 0.05 通過了 Bartlett 檢驗，說明研究數據效度非常好，修改後的研究項是合理、有意義的，詳見表 2。

表 2 「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
創新意願調查問卷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的檢驗		
Bartlett 球形度檢驗	KMO 值	0.837
	近似卡方	478.319
	df	153
	p 值	0.003

3 統計分析

3.1 總體情況

綜合 18 個題項，「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總均值為 3.92 分，遠高於 3 分的理論平均值。因此，我們認為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的創新意願較強。

平均分最低的是第 17 題「即使受到學校和家長的批評我也會把一些新的教學方法堅持下來」，為 2.63 分。最高的是第 5 題「我總是喜歡採用多媒體以及其他一些新的教學手段進行教學」，為 4.31 分。

3.2 影響因素

結合研究對象提供的信息，筆者分別考察了教師的性別、學歷、學校類別和授課形式等因素對創新意願的影響。具體方法為獨立樣本 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

3.2.1 性別因素

由於本研究中女性教師所佔的比重較高，所以筆者以男教師樣本容量 ($n=24$) 為基準，從女教師中隨機抽取組成一個 $n=24$ 的子樣本，且儘量保證其學歷等差異變量結構與男教師樣本基本相同。創新意願是因變量，性別是自變量，獨立樣本 t 檢驗的結果如下：

表 3 性別因素對「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影響

t 檢驗分析結果				
創新意願 平均值	性別 (平均值±標準差)		t 值	p 值
	男	女		
	(n=24)	(n=24)		
	2.85±1.05	2.75±1.05	0.342	0.734
*p<0.05 **p<0.01				

從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性別樣本對於創新意願平均值沒有表現出顯著性 ($p>0.05$)，意味著不同性別的漢語教師在創新意願上並沒有差異。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中，有專門針對教師性別的理論研究。其中，教師知識之經驗論認為，女性教師和男性教師在知識論及經驗論上是不同的，因此對事物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角度。所以，筆者在對問卷進行逐題分析之後，發現在第 8 題和第 17 題上，男性教師和女性教師的態度呈現出了顯著性差異 ($p < 0.05$)。其中，第 8 題 ($t=2.367$, $p=0.025^*$) 「我經常想了解對外漢語學科的新進展來充實教學」，男性教師的平均得分為 1.73，明顯低於女性教師的平均值 2.35，說明樣本中的男性教師對於學科發展的關注程度稍低於女性教師。在教師性別理論中，女性主義者提出過一種「教師知識之廣博化論」的理論，所謂「廣博化」是與「專門化」相對應的，也就是說教師的知識學習不應該局限在某一個區域，教師應該盡可能多地了解知識，甚至不只是追求學科知識，而應該對學生可能觀察到的事物都保持濃厚的興趣。這樣的觀點雖然略顯理想化，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教師的認知理論。

另外，訪談中也有教師提到「男老師的課堂氣氛常常更活躍」，「男老師似乎更受歡迎」等，其教學評價中常能見到「有幽默感」、「有精神」等描述。因此，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男

性教師似乎更關注教學實踐中具體的教學行為。此外，上文提到的均值最低的第 17 題 ($t=2.723$, $p=0.009^{**}$)，男性教師的平均得分為 2.73 分，同樣低於女性的平均值 3.62 分。這表明，女性教師在壓力環境下的教學創新意願較強，而且更加自信。眾所周知，無論在海內外，漢語教師群體中女性教師的比例一直高於男性，加之傳統文化男女有別的社會分工，導致男性承擔的社會壓力和職業期望高於女性，也比女性更容易產生焦慮、倦怠的心理（陳詩琦、王添森，2019）^[7]。所以當教學創新會帶來負面評價等潛在風險時，男性教師的創新意願很可能低於女性教師。

雖然在個別題項的選擇上，男性教師和女性教師的表現略有差異，但是就整體而言，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教師都十分願意學習新的平臺技術，都按時參加了學校開展的線上培訓等，並且都具有較強的奉獻精神，幾乎全部的漢語教師都願意積極配合學生的時間來調整授課。

3.2.2 學歷因素

本研究的被試所獲學位分為碩士、博士兩類。由於樣本數量差異較大，我們依照性別因素的方法進行相同操作，詳見表 4。

表 4 學歷因素對「新冠」疫情期間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影響

方差分析結果				
創新意願 平均值	學歷 (平均值±標準差)		F 值	p 值
	碩士	博士		
	(n=20)	(n=20)		
	3.35±0.94	2.56±1.00	6.534	0.014*
*p<0.05 **p<0.01				

從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樣本的創新意願具有

顯著性 ($p < 0.05$) 差異，且博士學歷教師的平均值 (2.56) 也明顯低於碩士學歷教師 (3.35)，說明碩士學歷的漢語教師具有更強的創新意識。

綜合數據統計與訪談結果，筆者得知碩士學歷的漢語教師「工作主要以上課、備課和各類活動為主」、「科研壓力不算大，但是學校（含語言機構）對教學抓得很嚴」而且「學生評教是教師評價體系中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在疫情期間，為了彌補線上授課的短板，有的教師在備課期間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搜集素材、剪輯視頻以充實課程內容，在製作課件和錄播課時「經常在技術方面消耗很多時間」，所以「線上教學的備課時間遠超線下教學」。但是，如果學生反饋良好，教師們依然感到欣慰。參與訪談的博士學歷的漢語教師雖然一樣對教學充滿熱情，但是他們往往有著更大的科研壓力。儘管博士學歷的漢語教師可能具有更完備的理論知識和實驗能力，但他們大多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認同傾向（陳詩琦、王添森，2019）^[7]，除了處理教學和管理工作以外，還有大量的科研任務。

一般而言，教師學歷與知識水平之間存在關聯。根據林崇德（2005）對教師知識結構的分類，教師的本體知識是基礎，是取得良好教學效果的基本保證，但並不是「唯一保證」，教師的本體知識要有，但達到某種水準即可^[8]。也有研究表明，教師的本體知識與學生成績之間幾乎不存在統計上的「高相關」。相反，「創造力」是教師勝任力模型中的基準特徵（徐建平、張厚粲，2006）^[9]。所謂基準性特徵，就是合格教師必須具備的，是對教師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對於漢語教師而言，無論是「教學型」還是「科研型」的教師，掌握漢語本體知識是基礎，提高教學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是保障，這不僅能夠促進教師本身的專業發展、增強複合型能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的學習能力。

3.2.3 學校類別因素

由於被試數量在學校類別上的差異較大，因此仍依照性別因素的方法進行操作。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樣本對於創新意願均呈現出顯著性 ($p < 0.05$)，意味著不同學校類別的教師在創新意願上存在差異，具體如下：

表 5 學校類別因素對「新冠」疫情期間
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影響

方差分析結果					
學校類別 (平均值±標準差)				F _值	p _值
小學 (n=15)	中學 (n=15)	大學 (n=15)	語言機構 (n=15)		
創新意願平均值	2.29±0.79	2.83±1.11	3.54±0.73	3.71±0.99	4.241 0.01**
* $p < 0.05$		** $p < 0.01$			

學校類別對於創新意願的影響呈現出了顯著性 ($F = 4.241$, $p = 0.01^{**}$)，四組的平均值為「語言機構 > 大學 > 中學 > 小學」，最高的是語言機構，最低的是小學。訪談中，有教師提到，語言機構一直以來都在為學員提供線上服務，如 VIPKID、LingoBus 等等。此外，語言機構的授課形式和時間是最靈活的，教師和學生一般採用線上約課的形式確定授課時間或地點。沒有應試需求的學生，也可以靈活選擇學習內容。以商務漢語課程為例，有的學生會要求教師專門針對自己的工作內容進行語言指導，甚至生詞的學習都是根據其辦公需要來選擇的。同時，由於語言機構的班型大多較小，一對一小課是主導，教師通常可以自行選擇教材，安排教學內容和進度，自由度較高，在教學創新上也有更大的空間。

大學教師的創新意願略低於語言機構，但也明顯高於中小學。很多中小學教師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課堂管理上，而這一點隨著學習者的年齡越低則越明顯。因此大部分的中小學教師都傾向於選擇最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因為「既對學

生負責，也能保證成績」，畢竟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普通中小學還是國際學校，學生、家長和教師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升學壓力。美國人 Watts 在 90 年代便發現教師在教學中的實用主義信念會阻礙教學改革的實施，外在因素（如教課負擔和學校政策等）會影響教學改革的實施和效果（林崇德，2011）^[10]。這種信念使教師無法或不願深入了解教學改革的具體操作，因此提早結束創新實踐。實驗結果表明，如果教師過度看重外在環境因素的阻礙，教學革新產生的影響將只能停留在表層。

在訪談中，很多中小學的漢語教師表示，當萌生了創新意願時，他們的想法常常「不能得到關注」，再加上教學創新的成本較高，一旦失敗，很有可能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和學校的成績，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在創新實踐上難免感到吃力，自我效能感也會相應降低。但是，Ross 等學者通過對學校領導力的研究發現，學校對教師的管理和培訓能夠有效提升教師的自我效能感，所以在教學創新方面，學校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林崇德，2011）^[10]。因此，無論語言機構、大學還是中小學，都應當採用多樣化的方式培訓教師的教學技能，加強對教師自我效能的關注，從而鼓勵教師積極開展各類教學創新。

3.2.4 授課形式因素

通過方差分析可知，疫情期間不同的授課形式樣本對於創新意願沒有表現出顯著性（ $p>0.05$ ），詳見表 6。

表 6 授課形式因素對「新冠」疫情期間
漢語教師線上教學創新意願的影響

方差分析結果					
疫情期間的授課形式					
(平均值±標準差)					
	直播課	錄播課	以上都有	F 值	p 值
	(n=52)	(n=27)	(n=25)		
創新意願	2.82±1.16	2.27±0.92	2.87±0.97	0.840	0.438
平均值					
* $p<0.05$ ** $p<0.01$					

訪談中，在中國境內和港澳臺地區工作的漢語教師普遍提到「直播課是最方便的授課形式」，但是「由於時差，疫情期間的線上授課有時需要直播課和錄播課相結合」，「單一的直播或錄播形式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有的教師會在直播的同時將課程錄製下來，讓學生根據時差靈活選擇回看的時間；有的則是以錄播課程為主，教師通過剪映等 APP 補充字幕、音頻等內容以豐富教學內容，同時輔以語音或視頻直播課為學生答疑，保持師生之間的定期聯繫；還有的教師直接借助 ZOOM 等平臺的優勢，簡化線上多媒體教學的步驟，減輕學生記筆記的負擔，另外有意識地增加操練環節的時長，儘量避免學生由於在家上網課而導致的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

因此，漢語教師基本上綜合運用了多種授課形式，所以在方法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實現途徑是相通的。

4 相關建議

要激發教師的創新意願，不僅需要教師自身的努力，人事單位也應當發揮引導作用。以下，擬從兩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4.1 漢語教師應認識到創新意願的重要性，緊跟學科前沿，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教學創新是一種過程，是教師在自己的教學實踐中從多個角度改進自己的教學所運用的種種手段和方法；教學創新也是一種結果，教學創新的目的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張敏，2011）^[3]。如果教師能夠認識到創新意願對於教學創新的重要作用，就會積極調整自己的狀態，努力學習新的知識和理念，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為線上教學尋求更適合的課堂安排與練習方式，以便更好地開展線上漢語教學。

所以，無論學歷如何，漢語教師都需要樹立

終身學習的觀念，及時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學理念。

4.2 人事單位可以積極營造有利於教師創新的工作環境，降低教師的創新成本

線上教學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而教學創新也是具有一定風險性的教學活動，一旦失敗，很可能会影响其創新意願和自信心，甚至影响教師發展。

所以，人事單位應當根據線上教學的實際情況協助教師調整課型、班型，同時賦予教師更多的自由度，鼓勵教師根據線上授課的實際情況調整教學。同時，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人事單位可以考慮增加關於教師創新的條款，鼓勵教師開展各種形式的教學創新，為參加境內外、長短期教學培訓的教師提供盡可能多的政策與資金支持。

5 結語

綜上，疫情期間漢語教師普遍具有較高的創新意願，但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學歷

及學校類別對創新意願具有顯著性影響，性別與授課形式的影響不顯著。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從而產生焦慮、職業倦怠等負面情緒；博士學歷的教師通常科研壓力偏大，創新意願略低於碩士學歷教師。

另外，目前的線上漢語教學仍有不足，教師對課堂的主導作用受限、備課時間增長等現實問題均有可能影響教師的教學實踐與創新意願。因此，本文試提出幾點建議，希望藉助漢語教師個人及人事單位的共同努力提升教師的創新意願和能力。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不足或局限，需要未來進一步深入探討。例如，考察的影響因素數量較少，後續可以進一步研究教師年齡、對計算機或教育技術掌握程度等因素對創新意願的影響；另外，本文是僅針對創新意願的單維度研究，在其他維度上性別、學歷等差異可能有所不同，日後可以開展關於漢語教師創新的多維度研究；還可以擴大漢語教師的樣本量，進行國別化的漢語教師研究等等。

參考文獻

- [1] 崔希亮。漢語國際教育「三教」問題的核心與基礎[J]。世界漢語教學，2010，24（01）：73-81
- [2] 劉力，葛凡堯。近40年我國對外漢語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熱點與趨勢——基於CNKI期刊文獻的可視化分析[J]。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2019，（04）：104-115。
- [3] 張敏，教師教學創新績效的結構及影響因素[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05）：115-119。
- [4] 王振宏，王克靜，遊旭群，黨懷興。教師效能、工作動機與心境對教學創新的影響[J]。心理科學，2010，33（05）：1254-1257。
- [5] 黃四林，林崇德，王益文。教師的創造力內隱理論[J]。心理科學，2005（05）：1243-1245。
- [6] 申繼亮，陳英和。中國教育心理測評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7] 陳詩琦，王添森，對外漢語教師職業認同現狀的調查與分析[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9，（04）：44-53
- [8] 林崇德。教育的智慧[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9] 徐建平，張厚粲。中小學教師勝任力模型：一項行為事件訪談研究[J]。教育研究，2006，（01）：57-61。
- [10] 朱旭東。教師專業發展理論研究[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